

白话二十四史

精 华

主 编 山 川 蔡 茂 友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K204.1
38
:4

白话二十四史精华

山 川 蔡茂友 主编

第 四 卷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向秀传

——《晋书》卷四九

向秀，字子期，河内郡的怀人。他高洁聪悟有远见卓识，少年时就为山涛所知，素来喜好老子、庄子的学说。庄子著有《内篇》、《外篇》等几十篇，历代有才德的士人虽然有读过它的，但没有能够恰当论述它的思想体系，向秀便对《庄子》索隐阐解，阐明其中的特异旨趣，宣扬道家谈玄的风气，使读它的人有离世脱俗心领神悟之感，无不自己满足于一世。到晋惠帝时期，郭象又论述并加以推广，儒家墨家的言论遭到轻视，道家的学说因此兴盛起来。起初，向秀要注解《庄子》，嵇康说：“这本书怎须再加以注解，正是阻止有人借此作典取乐。”向秀注解写成以后，给嵇康看，说：“这比你所认为的是否要好得多？”他又和嵇康谈论养生之道，相互诘问辩论，为的是激发嵇康高卓的情趣。

嵇康擅长打铁，向秀为他做帮手，两个人相对时都觉得喜悦，态度从容旁若无人。他又和吕安一起在山阳灌溉园子。嵇康被杀以后，向秀接受本郡的郡举来到洛阳。文帝问他说：“听说你有许由、巢父隐于箕山那样的志向，为什么却来这里。”向秀回答说：“我认为巢父、许由是拘谨自守的士人，没有能通达尧的心意，对他们不足以过份羡慕。”文帝很高兴。向秀便从此供职做官，写了《思旧赋》说：

我和嵇康、吕安的住处很近，他们都是有才能而不肯受拘束的人。嵇康志向高远而疏略于人事，吕安心性旷达而忽略人事，后来他们都由于犯罪而遭刑。嵇康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，尤其擅长演奏琴箫，临刑之前，曾经顾望日影，索取琴弹奏了一曲《广陵散》。我以往远行来洛阳，经过他的



故居，当时太阳已快落山，寒冽的冰水使人感到凄凉。嵇康的故邻有人吹笛，笛声清越高远，使自己追想起从前和嵇康、吕安的交游，被笛声感动而叹息，所以作赋说：

“奉命去京都洛阳啊，然后就转回来往北走。渡黄河乘船漂浮游荡啊，经过山阳的旧居。眺望旷野的萧条景象啊，把我的马车停在城边。去探访嵇康、吕安生前的旧居啊，经过隐僻里巷的空房子。叹息《黍离》悲悯周室的颠覆啊，悲哀《麦秀》面对殷商故都的废墟。思念往昔的交游情景而怀念今天这样的生活不能复得啊，心中感慨很多而犹豫停步不前。嵇康的故居还在而没有毁坏啊，只是人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从前李斯被处斩的时候啊，对儿子感叹再也不能一起牵黄狗出猎。痛悼嵇生的与世长辞啊，顾望日影而弹琴。临刑时已经领悟到自己的命运啊，把自己的余生寄托于弹琴的片刻之间。听见悲凉慷慨的笛声啊，美妙的笛声断断续续地响着。停着的车子即将出发了啊，所以就用笔写下自己的心意。”

向秀后来任散骑侍郎，转为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在朝时不任实职，只是安身而已。在散骑常侍位上逝世。有两个儿子：向纯、向悌。

【点评】向秀（约 227 ~ 272 年），字子期，河内怀（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人。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擅诗赋。喜好老、庄之学，曾为《庄子》作注，“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”。他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，将儒道合为一。他的好友嵇康被杀以后，曾应征到洛阳，官至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他的作品今多散佚。



羊聃传

——《晋书》卷四九

羊聃，字彭祖。年轻的时候不肯研究学问，当时的舆论都鄙视他的平凡无能。原先兖州有号称“八伯”的八个人，以比之于东汉时代的“八俊”，在这此后又有所谓“四伯”。大鸿胪陈留人江泉由于能吃号称“谷伯”，豫章太守陈留人史畴由于是个胖子号称“笨伯”，散骑侍郎高平人张嶷由于狡诈号称“滑伯”，而羊聃由于凶狠暴戾号为“琐伯”，这是他们比为尧舜时代的“四凶”。

起初羊聃在晋元帝当丞相的时候被征召为相府的从属，连续升到庐陵太守。他的性格刚强粗暴，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，比一般人更为任意放纵，别人瞪他一眼这样的小事就会遭到杀戮。他怀疑庐陵郡简良等人是盗贼，杀了二百多人，连婴儿也杀了，其他被剃去头发锁起来做苦工的还有一百多人。刺史庾亮把他抓起来，送到京城。有关的官员上奏说羊聃的罪行应该处死，但由于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，按一般情况符合减刑的条例。晋成帝下诏说：“羊聃的罪行古今都找不出来，还有什么可减刑的！不过还不忍心让他陈尸在集市上，可以在监狱中让他自杀。”羊聃哥哥的儿子羊贲娶公主为妻，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姻关系。晋明帝下诏说：“罪行不能牵连别人，这是古今都一样的好法典。羊聃虽然处以极刑，和羊贲有什么关系！不允许离婚。”琅邪太妃山氏，是羊聃的外甥女，上殿向成帝叩头请求饶羊聃的性命。王导又启奏说：“羊聃的罪行不容饶恕，应当处以重刑。但是山太妃忧伤成病，陛下的恩惠像苍天一样无穷无尽，羊聃应该蒙受宠宥，保全一命。”因此晋明帝又下诏说：“太妃只有这一个舅父，为他求



情，说话伤感呜咽，以至于吐出血来，感情很深忧虑很重。朕以前经历苦难受到太妃的养育之恩，和慈母一样。如果太妃经不住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以至于病逝，朕也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。现在就饶恕羊聃一命，以此安慰太妃对舅父的感情。”于是就免官为民了事。不久，羊聃得病，病中常常看到简良等人在作怪，过了十天就死了。

【点评】《晋书》不立《酷吏传》，这大约和两晋社会的剧烈动荡、门阀统治要求调整和上层阶层间的矛盾和玄学的兴盛，因而缺少张汤、董宣式的人物都有关。但在一部《晋书》里，还不时可以看到酷吏，这位羊聃就是比较典型的人物。他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，残杀无辜百姓几百人。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的“八议”译文很难译出。这是从周朝以来统治阶层的一种特权，凡属于功、勋、亲、贵等八种人犯罪，可以讨论减刑。羊聃的残暴使晋成帝都觉得太不像话，不应入“八议”之弄，只是由于一贯主张调和矛盾的王导讲情，才免于被判处重刑。

皇甫谧传

——《晋书》卷五一

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幼年名静，是安定朝那人，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。皇甫谧出生后即过继给他叔父为子，随叔父迁居新安。他到二十岁还不好好学习，终日无节制的游荡，有人以为他呆傻。曾经得到一些瓜果，即进呈给他的叔母任氏。任氏说：“《孝经》说：‘虽然每天用牛、羊、猪三牲来奉养父母，仍然是不孝之人。’你今年近二十，眼睛没有阅读过书本，心中不懂道



理，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。”因此叹息说：“从前，孟轲的母亲迁居了三次，使孟子成为仁德的大儒；曾参的父亲杀猪使信守诺言的教育常存，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，教育方法有所欠缺，所以你才会如此鲁莽愚蠢呢！修身立德，专心学习，是你自己有所得，我能得到什么呢！”因而面对皇甫谧涕泪交流。皇甫谧深受感动，并激发了他的志气，于是到同乡人席坦处学习，勤读不倦。他家很贫穷，每每带着经书去干农活，以便在休息的时候能诵读，于是广泛的阅读了国家的重要文献和诸子百家学说。他性格沉静，很少欲念，开始有崇高的志向，就以写作为事业，自号玄晏先生。著有《礼乐》、《圣真》等书。后来得了风痹症，仍不停的阅读和写作。

有人劝皇甫谧多和达官贵人交往，以博得好名声。皇甫谧认为“只有圣人才能出仕作官得到好名声，隐居田里也享有尧舜之道的美名，自己不是圣人，又何必结交达官贵人，为公事忙碌，然后得到名声呢。”他写《玄守论》来回答他们，说：

或有人对谧说：“人人都渴望得到富贵，人人都厌恶贫贱，为什么将自己的形体托付给贫穷而不想改变呢？况有道的人所看重的是治理国家的学问，而一般的人则以及时享乐为美事。先生已年老体衰，衣食亦不充裕，如为生计奔波死于溪谷，有谁会知道您呢？”

谧说：“人最珍惜的是生命，修道求的是形体的完备。生命和形体都不可为疾病所侵犯。若扰乱了形体以致损及性命，怎么能脱离贫贱而存富贵呢？我听说吃人家禄米的人就得分担人家的忧患，形体强壮的人尚不堪承受，何况我体弱多病呢！而且读书人经常是贫穷的，求道的人的确也常受到轻视，然而处于贫穷之中而得到道的真谛，一辈子没有忧患，怎么能与为了追求富贵扰神耗精相比呢！另外，生时不为人知道，死时不被人惋惜，这样的人才是最得道的真谛



呀！聋哑的人，是天下最得道的人。一个人死了，天下的人都为他号啕大哭，因为他的死，对天下有很大的损失；有的人健在，全国的人都为之而欢欣鼓舞，因为他的健在，对全国人都有好处。然而，天下人的哭或笑，并不能使该死的人不死，该生的不生。所以有至道至德的人，不会因外界影响而损益到他的死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体魄充实。如果为了挽回天下人的悲痛而去追求损害生命的名利，顺应全国人的心意去追求无益于身的富贵，这哪是道德的至高境界呢！只有不追求名利，才会无损于性命，身体才会更强壮；只有不求无益于身体的富贵，道行才会更深厚。身体强壮就不会损及生命，道行深厚就不会变浅薄。如果能保持坚实的身体，深厚的道行，将名利、富贵置之度外，看作只是形体表面的东西，那么我的道行是最完善的。

于是，皇甫谧没有去做官。他潜心玩味经典册籍，甚至废寝忘食，故当时人说他是“书淫”。有人告诫他，过于专心将会耗损精神。皇甫谧说：“早晨学到了道理，黄昏死去也是值得的，何况生命的长短是上天预定的呢！”

叔父后来有了儿子，且已二十岁了，这时皇甫谧四十，叔父儿子的生母游睦了。于是皇甫谧回到了本宗。

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堂姊妹的儿子。当梁柳要去城阳赴任时，有人劝皇甫谧为他饯行。谧说：“梁柳未做官时探望过我，我都不出门迎送，吃饭也不过盐菜之类，贫穷的人不以酒肉来招待。现在他当了郡太守而以酒宴来饯行，是看重城阳太守的官职而看轻了梁柳本人，难道这符合古人的为人之道吗？那样做，我的心里会不安的。”

当时魏郡守曾召他充任上计掾，也曾举荐他为孝廉，景元初，相国也曾征召他，但皇甫谧都不赴任。后来乡亲们都来劝他应召，他写了《释劝论》表达他的志向。该文辞说：



相国晋王征召我们三十七人，到泰始元年晋皇帝登位时，被征召的人都到达，并都授予骑都尉之职，或赐以关内侯之爵位，有参预朝政的资格，受到如皇帝侍臣的待遇。只有我为疾病困扰，得不到国家的恩宠。同宗之人、父兄以及历次与我一起被征召的人们，都以为天下大庆，百姓有了依赖，我虽然没有参加登禅大典，也不应安于寝食，纵然有严重疾病，也应当投身效力。我仅以古今圣明王朝的制度为准则，无论事情大小，都要按具体情况而定，实在是力不从心，那里是怠慢呢！于是伏枕叹息说：“去当官的话，身份荣耀；退隐归家，可保全性命。如果我没有生病，躲避征召就如巢父、许由之隐居箕山，尚且可以容忍，何况我实在是病重呢！所以在尧舜的时代，有识之人或隐迹于深山泽国，或如大禹过家门而不敢入。但咎繇之流却能出仕隐居两遂其愿，他们是遇到了好时机呀！所以，朝廷器重有功的臣子，百姓赞美实现自己志愿的有识人士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哪！现今圣帝接位，皇朝兴旺，可与前代圣君明王同享盛名，仁者的轨迹是不会遥远的，我们也必然会遭逢古人那样的机遇。朋友或用一般的道理逼我去出仕做官，或因我不顺世情而为我担忧。我认为，上面有宽容圣明的君主，下面一定有听从他旨意的人士，天网是那样的宽广，被罗入天网中或被遗留下来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何以出仕的人要受到褒奖，而退隐的人要受到责难呢！所以推究朋友和自己的言论，以解疑释难，命名为《释劝》。

朋友说：“听说天空日星高照才能有光明，大地阴阳通畅才能有万物。所以黄钟按次序排列，律吕分形象正音。春天的花发萼开花，夏天才盛结果实，秋风到暑热，冬天及能结冰。人伦之道也是按照这个道理，顺应时机而发生发展。天人相应，就像符契一样，故有识之士，或如在尧舜之时共



同得到举用；或如伊尹为商汤迎于有莘；或如里人为殷武帝夜梦所遇；或如姜太公渭水遇文王而舍弃垂钓；或如宁戚叩牛角而歌，得齐桓公之重用；或如伯里奚为秦缪公所赎，脱去布衣而事秦；或如郑子产甘冒毁谤使郑国安定；或如祈奚乘驷去见宣子以免叔向之罪；或如伍举班荆与友蔡声子坐，共同商议归楚问题；或如张良从黄石处学得兵法知识。这些有识之士，都是遇到了明主，飞黄腾达，越格提升，声名日盛，远播四方，如清音充塞宇宙。由此看来，进取要及时抓住机会，为什么要屈志节而不伸展抱负呢？现在，以你的雄才大略，精于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六艺，又广泛研讨了其他各种精微奥妙的道理有多年了。既然遇到了新帝接位这样的盛世，又逢取得禄利的时机，皇帝圣明，可以委属，同僚相遇，都是知己，这种清明的时代，正可以奋勇前进，大干一番，真是我们此生奋发有为、大展鸿图的时候。如果隐居山林，满腹才华没有显露，就像蛟龙潜藏于九泉之下，固执隐居念头，放弃了通向仕官之路，守着耿介之人的局限操守，不是与有道之士的志趣相违背吗？

我听说招摇星辰、晨昏交替运行是天体正常的表现，父母兄弟子次序有常则是人道安定。现在皇帝的诏命急切传来，委托地方官吏来谋划处理，而你不应召，则会招来上违背皇帝命令之罪，下使大家为之担忧。明智的人贵在随俗俯仰，又何必与众不同呢？许多贤士都随众出仕，你又何必固执己见？今天，和你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京师，忙得饿了都顾不上吃饭，出仕朝廷，皆任高官，独你居于陋屋，放浪形骸于世情之外，退隐于山林田院，鄙视荣华富贵，仁惠也不施于百姓，这种隐退行为并不合于至道，身为大病所困，性命难以保全。再说时光匆匆，一去不复返，失去机会，后悔不及，还有什么作用可言！不在乎璧玉而珍惜光阴，圣人



们皆受此约束，因此皇上一下诏，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赴任，是明智的人所遵守的规戒。你应该以古圣先贤之大法为借鉴，迎合圣朝虚心求贤的盛意，展开神灵的翅膀飞向凌云的天衢，到天池去洗濯鳞甲，推开天门，步入玉台，跨进紫宫的小门，陪伴着北辰，景况就大为改变，人才济济，如落英般繁荣。辅助唐虞一样的明主，教成如尧舜时期的风尚，宣布刑法搁置不用（无人再犯法）的政令，配以殷周时期的大臣，功勋将铭刻于景公钟上，以常理而论，在官则列鼎而食，不在官则为公卿大夫的家臣，不也都是美事吗！轻视黄金白银，忘却青紫之印绶，推辞尊贵的衣服，终年穿着破烂的粗布衣服，不苦吗？”

主人笑而答道：“嗨！你们可以说是只习惯于从表面看问题，隐士心理的深处就看不透了；只看到世俗之人的狭隘，就不明白圣皇宽广的胸怀，只拘泥于规可以正圆，矩可以正方，不知天地之大无所不包。所以说，天空幽远而清廓，大地宁静而广褒，天地包容万物、泽被众生，我们生活于圣明之世，托天地之福。春天阳气上升而散发，冬天阴气下降而凝结，泰液池水含万物而化生光彩，元气未分，混沌为一，万物仰赖天地的化育，产生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性。所以，出仕为官的人享受朝廷的俸禄，隐退之士安居于山陵，寒来暑往顺序相移，四季遵循着一定规律交替，天地任运自然而动，形成物质世界的无穷变化。然而事物都是天然分定的，阳的，阴的，动的，静的，都能按它们的本性正常发展，阴阳二气得以充分发挥作用，这就是所谓的‘大同’；彼此没有抵触，没有乖违，这就是‘至通’。

到了春秋时期，狡诈的人，受到国君的重视；诚实的人，反而被视为没有才华。故苏秦出而说服六国纵合以抗秦，张仪则以连横政策游说六国与秦修好，赵国因有廉颇而



名重于诸侯间，燕国则因乐毅将军的离去而衰弱，魏国因公叔没的离去为齐、秦等国战败；孙臧受刖刑后为齐国所有，齐国得以安宁，越国任用范蠡、文种得称霸，楚王疏远了屈原为秦所颠覆。所以，国君的地位并不稳定，大臣也没有固定的名分，损仁义或以诚相待，有使国家衰败或强盛之别。冯援弹剑而歌，感动了主人孟尝君，女宽说服魏舒拒绝贿赂，项羽虽有拔山之力，仍兵败而自刎乌江；蒯通献策韩信要韩与刘邦、项羽三分天下，东郭先生被田荣劫掠，颜阖以鲁王礼聘为耻而逃走。这种人皆是背弃礼义丧失天良，是只图眼前朝夕荣辱的急性人，哪里是寻求事物规律变化的本性呢！

圣帝开创的王朝，功德可以和伏羲、神农并列，风俗教化可和虞舜、夏禹媲美，希望柔和而舒畅，不希望分析明辨而相责；希望如水之滚滚渊源流长，不希望名声传播如荡涤之势；希望小心谨慎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，不希望问题如同绳索结成死疙瘩而忧苦；希望知识广博无际，不希望窄而局限；希望人的道德深远谦退，初视未见而后明著，不希望明白显示如冰雪之洁白；希望用道德教化百姓，不希望事无巨细，一律绳之以法。所以见机而作的人，由于仕进而成其大功，喜欢隐居的人，也遂其所愿而不加强制。所以说，既懂得阳明也懂得阴暗，是懂得了天道之梗概；既知松弛，也知谨慎，符合礼节的规定；知道世事的浮沉，也就兼得了道和礼的真谛。所以上有皇帝对有识之士谦恭接待之爱，下有并不出名的臣子；朝廷有聘用贤士的典礼，山野有避世的贤人。所以支伯以自己有幽忧之疾而拒绝唐尧的禅让，老子李耳乘牛车西去大秦，颜回以安居陋巷而成名，原思安于至贫而乐道，荣期以自己有三乐（指为人、为男和长寿为三乐）使孔子深为感动，黔娄终身为布衣不仕，段干木隐居守道于



魏国，荆莱虽居江边仍有崇高志向，君平隐于卖卜，依耆龟以忠孝信义教人而有道名，四皓（指秦末东园公、角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四人，年皆八十有余，须眉皓白，故名四皓）有德，隐居于洛水之滨，郑真亲自耕种，世人钦佩他的清高，幼安避乱辽东，讲诗书，明礼让，至今百姓仍受到他的感化。这些人都保持着难以夺去的节操，坚持不可屈服的意志，遇到超俗的明主，便能成全他的志向。所以有能独自定计谋的人，就不与其他人商量；坚守不可动摇的信念，就不考虑众宾客的建议。因此，能放弃如同皇室戚属那样的华贵，追求内在道德的真谛，不走明显可达富贵的道路，而愿进入昏暗不明的世俗中，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，排除空虚寂寞而寄身于中，居住于简陋的房屋，结交并不看重金钱利益的人。或轻如鸿毛，或重如泰山，损伤了他们，就得不到他们的辅助，而得到了他们，在实践中磨炼他们，更加觉得他们学识高深。这些人真是我们可以效法、可为表率的人。我因为疾病困扰而不能达到这一境界，你们因为我以前没有应召出仕作皇帝的“侍臣”而受到惊吓，我也怪你们只知计较寻常之理而不知折衷相处。

有才不为朝廷所用，会受到世人的责难；卧病多年，会为朝廷所抛弃。所以晋下军佐胥克患蛊疾，为正卿欲缺所废；伯牛生了病，孔子去探望时叹息“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”。如黄帝创制了九针之经，岐伯有剖腹去肠之术，扁鹊经虢国而使太子起死回生，文挚用激怒法为齐王治病牺牲了生命，医和以医术显名于秦晋诸国，仓公阐发了汉皇秘典，华佗有独到的见识和精湛的技术，仲景制定的方剂流传后世。只恨我生不逢这些医家，故只好乞求申诉于圣明的皇帝之前。请求在朝廷簿录中去掉我的名字，原谅我抱病之体的痛苦，希望我诚恳之心能感动上天，我在穷乡僻壤之处等待



朝廷的罪责。

后来武帝屡次下诏督促逼迫出仕朝廷，皇甫谧上书自称草野之臣说：“我因患匡痹症，迷恋道之旨趣，因为有病而归隐林泽山川之间，不懂人伦礼法，常与鸟兽为伴。陛下到处求贤，连我这样不是贤人的人也被收取了。贤人皋陶脱去布衣当了官，不贤的人就远远的离开了朝廷。我只是个顽钝愚蠢的人，我吃晋王朝的粮食，享受着天下太平、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，应该到京城去，在宫阙之外，高呼皇帝万寿无疆。我因品德不良才招致灾祸，久为疾病所困，半个身子麻木不仁，右脚肌肉萎缩变小，已有十九年。又因服寒食散，违背了服食的规则，反造成毒害，至今已有七年。盛冬时得袒露身体服食冰雪，暑天更觉烦闷，并伴有咳嗽气喘，或像患了温症，或又类似伤寒症，气急浮肿，四肢酸痛。现在情况更为严重，生命危在旦夕之间，父兄见了离去，妻儿常待决别。如果迫于皇帝的权威乘车上路，则病痛更会加剧，所以只好不走仕途之路，将身待罪，俯伏枕上叹息。我听说《韶》、《卫》两种音乐不能同时演奏，《雅》、《郑》两种曲子也不能同时演奏。周时王叔（晋厉公）受离间计而杀郤子，自身反被牵连作为郤子同党而被捕；虞丘是贤者，但因多年未举荐贤良、斥退不肖为楚庄王夫人樊姬所讥笑（虞闻之而荐孙叔敖，楚得孙辅，三年而称霸）。所以，有地位的人和被统治者，在敬神典礼中用不同器皿，何况我这大麦糠皮的本质，怎能和菰米相糅和呢！我如同一个平庸的人，穿着显贵的锦缎绸衣是不相称的。我听说与我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达京师，只有臣我因有疾病，待罪床席，虽也贪图能有光明的前途，但惧怕在路途丧命。即使我没有疾病，且已遇到这样的尧舜之世，如巢父、许由高隐于箕山，亦尚可容忍。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，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；上有宽容的政策，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。只有陛下能留心才智之士和宽待我这样久病的人，希望能重新旌表奇才



异能之士，从傅岩索请隐居的贤人，从渭水之滨请来（像姜子牙）垂钓的隐士，不使泥滓久久的混杂于清流之中。”皇甫谧的恳切言词，终于获得了准许。

过了一年多，又被举荐贤良方正，都不去。自己上书给皇帝要求借书。皇帝送给他一车书。他虽然患有重病，仍勤读不已。开始服寒食散，因身体素质与药性相抵触，常常困顿疲惫不堪，曾悲愤而想持剑自杀，经叔母劝阻而打消了念头。

济阴太守四川人文立，上书皇帝，认为任命贤士送礼物很麻烦，请求免去礼物币帛，皇帝下令从其所请。谧听说后叹息道：“亡国的大夫，不可和他计议国家存亡的大事。用他的建议，革除历代相传制度，怎么可以呢！用小小的束帛来作为聘用的礼节，是《易经》明确规定的，用玄色的玉帛征聘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制度。所以孔子宣称夜以继日的努力学习以等待前来请教的人，有道之儒者，就像宴席上的珍馐，等待帝王的召聘。真正的儒者，经过王者的三揖，方才进而出仕，说明招纳贤士之难；一有微词诘责，便引身而退，说明贤士离去的容易。如殷汤礼聘伊尹，文王对于姜太公，或聘迎于莘之野，即任以国政；或载与俱归即立为军师，都只恐怕礼仪不够隆重，怎么会吝啬其花费之大呢！而且如果缺少一种聘礼，贞节的女子即觉得是一种耻辱，何况著名的贤士呢！孔子说：‘赐呀！你爱的是羊，我爱的是礼仪。’放弃了礼会怎样呢？朝廷丧失贤士，就是因为这种原因。

咸宁初年，又下诏说：“皇甫谧从容不迫平凡自安，坚持学习，喜好古文献典籍，与世俗之人有完全不同的志趣，故任命谧为太子中庶事。”皇甫谧以病重固辞。开始，皇帝并不勉强他改变志向，不久以后又下诏征辟皇甫谧为议郎，后又补任命为著作郎。司隶教尉刘毅请任命皇甫谧为功曹，皇甫谧都没有接受。写了有关葬送制度的论著，命名为《笃终》。说：

玄晏先生认为，生死是大自然的规律，是人理的必然趋



势。按礼规定，六十岁时就制定寿具，直到九十岁，寿具各有不同的等级差别，在平日就准备好以防终日的到来，这哪里是世俗多忌讳的呢！我年龄虽未到六十，然而为疾所困已十多年，屡次遇到丧亡的危难，精神形体都遭到损伤，濒危已多次了。我常常恐惧不知何时就夭寿而终，忧虑身后之事平时没有准备，所以大略地陈述我对葬送的真诚看法。

人所贪恋的，是生存；所厌恶的，是死亡。但虽然贪生，也不可能越过寿命期限；虽怕死，也不可能逃脱。人死了，精神活动停止，形体腐败消散，但魂魄如大气一样，无处不到，所以气属于天，寄托于形体的生命终会达到极限，但最终的尸体，返于本来的真寂，所以，尸体藏于地。神如果不再存在于人体，则与大气同升降；尸体不能长久地保存，与大地合为一体。形体与神是不会不相合的，这与天地的性质一样；尸体与大地合并，是返于本来真寂的至理。今天活着尚且不能保护七尺的躯体，为什么死了要隔上一个棺木呢？死后穿的衣衾反而弄了尸体，使用棺槨反使与大自然（土地）隔绝，所以桓司马自为石槨，三年未成，孔夫子说，还不如速朽为好；季孙与美玉同葬，就如暴露尸骸一般；华元等厚葬宋文公，《春秋》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臣子所为；杨王孙遗嘱裸葬，《汉书》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远比秦始皇贤明。如果认为灵魂必定有知觉，则人与鬼虽有不同制度，但在黄泉的亲戚较活着的人多，他们必将会准备器物，用来接待死亡的人。今天若用活着的人的想法来比拟死了的人的思想，那就不是灵魂本来的意思了。如果灵魂本来就无知觉，则厚葬就是白白夺去活人的东西，消耗在毫无益处的死人身上，而且使奸诈之人生盗取之心，反而招致暴露尸骸之祸，增加对死者的毒害。

葬的意思是藏。藏，是不想让人看见。而大做棺槨，又



将生时的物品用来陪葬，就好像在路边埋了金子又写说明书在上面一样。虽然是极其愚蠢的人，也会笑话的。以丰厚的财宝厚葬死者使奸人生偷盗之心，或是打破棺材；或将尸体牵拽；或割断胳膊取下金钗；或按摸肠子探求珠玉。这种剖棺盗金玉，比之烧杀之刑，不更为惨痛吗？自古至今，没有不死的人，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坟墓。故张释之说：“假使其中有利可图，即使把棺柩封锢在南山的下面，还是有隙可钻的；假使其中无利可图，即使没有石棺柩，又有什么可发愁的呢！”这话实在是表述得很全面的，真可为我的老师。为死者加以厚葬，并不是对死者表示孝心，而是给活着的人看，遂作出对生者死者都毫无益处的厚葬，抛弃死者的遗嘱，聪明的人是不这么干的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古代的葬法，以草盖死者，葬于荒野之中，也不积土为坟，也不种树以标其处。”所以死者能回归大自然，也不会伤害生者。

所以我希望早晨死，黄昏就葬；黄昏死，早晨就葬，不备棺木，不用布帛缠裹，不修饰，不沐浴，不缝制新衣服，口中珠玉也一概不用。我本来想裸体入坑，身体直接与土接触，恐怕亲人受世俗影响已久，要立时革除这种习俗很难，所以我今天粗略定下规矩。奢侈不过石椁，收敛只要不裸体。气绝以后，即穿当时穿的衣服，以及过去用的旧幅巾，用粗席裹上尸体，用麻绳捆住尸首两头，将尸体停放床上。选择不能长粮食的地，挖深十尺、长一丈五尺、宽六尺的坑。挖坑完毕，将床抬到坑边，抽去床，将尸放到坑中。生平所用之物，都不用随葬，只需带着《孝经》一卷，以表示不忘孝道，粗席之外，便直接接触土地。坑中土填到与周围地平，然后种上以前原有的草，使草继续生长在上面，不种树木、不铲除上面的杂草，使无迹象可知葬处，自己寻求也不能知道。不见可图之利，则奸人不会生偷盗之心，自始至